

导 言

银 Ag 在地壳中的含量很少 仅占 $1 \times 10^{-5}\%$ 但却在中华民族经济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对中国人的经济意义是由于日后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开展 从美洲到东南亚、再到中国的丝银之路 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对白银的需求相适应 ,在明代中后期引发了中国传统币制的变迁 从以铜为币转变为银铜并行于流通领域 大量白银汇聚于中国^①。而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从经济学意义而言更多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场白银(资本)争夺战。从明末到 1935 年法币改革,可谓中国经济领域的白银时代。

当流通于市的货币进入学者的视野而成为研究对象时,货币理论或货币史的研究就产生了 并积累了大量相关信息 然而目前看来 国内学术界关于近代货币史的著作和文章很多 但是从经济史的角度论述货币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论著还不多。而所有的经济学家均认为货币与宏观经济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近现代 人们更认为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 而货币是金融之血。本书便试图论述中国自铸银元产生后近代货币体系与近代经济的关系。

万明最近发表的论文强调了这一观点。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 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河北学刊》2004 年第 5 期;《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参见〔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版。

一、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状况

近代中国，银锭、银元、银角均是白银所穿的不同货币“外衣”而纸币、铜元、制钱又均与其极度相关。白银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

（一）关于本选题的分析工具

货币史的研究是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学术工作。简言之，它需要三种分析工具：一是历史学的方法，二是经济学、金融学的方法，三是钱币学的分析方法。因而有机地将三者结合起来，对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自身及其与近代经济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才能得出较为合理的结论，并总结出近代中国经济进程中的一些规律。

历史学的方法相对而言已被较多论及，因而这里主要探讨经济学与钱币学的方法与功用。

货币的运动是受经济规律制约的。近代以来经济学已经走过

具体到经济史的方法，1981年，东北三省召开了中国经济史学会首届年会，会上孔经纬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魏永理的《略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赵德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的建设问题》均涉及研究方法。参见东北三省中国经济史学会1982年编印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1986年严中平先生曾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国近代经济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参考讲义》。而吴承明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收录入其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2001年吴承明先生不仅在诸如《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相关文章，而且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更进一步深入讨论了经济史研究方法。曹树基先生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上发表《经济史学的方法论：描述与分析——评〈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一文。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史组对这一年的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评述是：“中国经济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其理论方法不少源于西方。吴承明对中西方不同的历史观及史学传统加以比较，认为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具有艺术（教育）功能，应有实证和规范两种价值判断，在坚持‘史无定法’的同时，强调实证主义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反对在经济史研究中搞模式法、决定论、预期论。萧国亮认为，经济史研究既要有今天的视野，又要有历史的视野；要用诠释的科学对历史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又要用批判的科学为‘改变’经济世界开辟道路。李伯重强调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如果我们真正破除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摆脱传统汉学的‘边缘心态’，把中国历史放在全球范围内探索，中国史研究自然会融入国际学术主流。赵德馨针对一些年轻人热衷于靠引进外国理论搞史学创新的倾向发出警告，外国理论不一定适应中国国情，不加分析、不加选择地照搬外国理论是一种很大的危险。见《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中国经济史篇》中国社科院网站。

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时期 因而 经济学的发展在某种层面上决定着货币史研究深度与广度的进程。

20 世纪 40 年代以前，中国学术界还处于学习介绍西方古典经济学时期 货币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讨论货币的本质 因而这一时期的货币史主要是讨论货币的起源、货币的职能以及货币的本位等问题。在当时中国货币时政领域，人们也仅在这个层面上讨论和认识货币^①，这种认识决定了当时货币史研究的方向。

40 年代后，西方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央银行的日益巩固，已使货币史研究步入了探讨货币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恰如 1947 年一位学者所言：“货币理论的研究大约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时期：（一）货币价值研究时期，（二）货币经济研究时期。在前一个时期，货币学只研究货币价值的意义和货币价值的决定。在第二个时期里，货币学不仅研究货币价值的问题，而且要往前大大的踏进一步，着重研究社会经济的整个投资，储蓄与所得的动态的关系 因此 它所研究的范围比在第一个时期里面要宽广的多了 简单一句话 现代货币学的领域与动态经济学的领域几乎没有什么区别。”^②这主要是指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将货币理论引入宏观经济而引发的货币理论的变迁。

然而在中国刚刚开始介绍西方现代货币学理论后不久，剧烈的社会变革使中国迅速进入了计划经济时期，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成为批判的对象，在西方国家依此调控现代经济并更进一步地深化货币与宏观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的同时，“本本主义”在中国成为学术圭臬，经济学教材为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银行与信贷》，

可参见赵兰坪：《货币学》 正中书局 1936年版。当代学者认为：“从金融学的发展演变来看 传统的金融学形成于 20 世纪初，主要研究货币、信用、银行三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现代金融业的不断发展，金融学的内涵也变得日渐丰富。20 世纪 30—40 年代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 使得货币政策、金融调控等宏观经济学内容被纳入了金融学范畴之中。参见王广谦等：《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9页。

② 樊弘：《现代货币学》 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 第 1 页

银行和货币成为国家财政的附属，中国的货币与宏观经济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因而这一时期形成的货币史研究成果依然处于对历史进行描述并依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货币的价值及几大功能进行讨论的状态。与前一个时期的研究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除了加入阶级分析的定性方法外^①（如法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几无新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发生了爆炸式的演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经济学界大量汲取西方经济理论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了广泛的理论探讨。然而，迅速变化的经济学理论在货币史研究领域的反映较为迟缓。到目前为止，国内货币史研究领域内，结合此种经济学方法对近代货币史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还比较少见。

经济学理论是不断发展的，20世纪下半叶，即使是在市场领域中，新古典经济学也显得不再那么得心应手了。自20世纪90年代科斯和诺斯^②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产权、交易成本（费用）制度（Institutions）等新概念的引入，以及从制度层面对经济的深

以《上海金融史话》为例，其前言云：“历史情况异常繁杂，怎样着手进行分析研究呢？这就要求‘牢牢把握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论国家》）我们编写《史话》也力求运用这一原则。”见上海金融史话编写组：《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

诺斯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也是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其主要著作有：《美国的经济成长》（*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A New Economic History*）、《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西方世界的兴起 新经济史》（*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制度、制度的变革与经济表现》（*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其中许多著作已译成汉文出版。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讲演时他说，他是“从马克思主义转变到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读研时“所设定的目标，是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济体系运作的方式及其成败。显然，经济史是最符合这一目标的范畴”。

入思考^①，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以数学为语言论述其实质的今天独显其理论的智慧。在货币领域，货币制度本身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实例，而且在处理制度变迁时，政府与经济实体的关系及传统的‘路径’理论均使学者在认识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时深入思考，并提供了较为实用的理论工具。

在研究经济史的时候，关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而现时经济学家的论述同样给人以思考的空间。特别是林毅夫先生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给人启发尤大。此外杨小凯先生也运用经济学理论对中国近代经济史进行分析^②。

货币史的研究离不开钱币学的研究，后者在西方学术界有着与碑铭学一样十分显赫的地位，许多古代国家或死文字文明的历史是靠钱币对王系的回复而开始的。对钱币学的研究相对于货币史恰如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钱币实物会在很多层面正确回归复原历史的真实，是第一手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极多的近现代货币史领域，这种复原更为重要，可以纠正对文献的依赖和误信。例如一些学者依 1914 年《国币条例》认为中国货币体制已是银本位制，留存的钱币实物给这种论断留下了极大的商榷空间。在国内除建国初期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在这一方面有着独特的学术造诣和建树外，较少有论著涉及钱币实物与货币史研究的关系，十分可惜的是彭著仅论及晚清以前的中国货币。

（二）相关文献的评论

学术研究离不开前人的工作和努力。本书在有机结合历史的

^① “在传统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多少还是一个外在变量，一个相对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在科斯这里，制度已成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内在变量。它像其他一切经济物品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盛洪：《经济学精神》，《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如杨小凯：《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晚清的经济历史》、《民国经济史（1912—1949）》等 见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网站 www.sinoliberal.com。

逻辑和经济学的逻辑的基础上,将分别讨论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货币与金融业的关系及货币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下面对这几个层面的学术成果进行简单的评论。

1. 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研究

1890—1945年,世界货币体系经历了金本位体系的确立和崩溃,金汇兑体系的剧烈变化及信用货币时期。当时国人留下的文献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中国应当确立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及如何与世界货币体系接轨。

对于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当时的外国学者和当代的一些国内学者多认为其“混乱”“混沌”^③;“世人皆认为最复杂的一种”^④;“芜杂紊乱,五方杂居”^⑤。有的经济学家更认为:“吾国历来仅有货币,而无币制。”^⑥这说明人们并没有总结出中国独特的货币体系。后人有关的货币史和金融史的著作主要讨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的性质、本位或制度^⑦。对近代货币制度本身的评判说法各异。传统的中国货币史学界一般认为清代的货币本位是银钱

如 Frederic E. Lee: *Currenc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2 及 Wen Pin Wei: *The Currency Problem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1914。

如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370页。

如20世纪初曾在《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发表过大量有关中国货币文章的 D. McColl 就曾这样表述,后其文章结集为 *Chinese Currency* 无出版年月。

④ A. W. Pinnick 著 褚保时等译:《银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页。

⑤ 这是日本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对中国货币体系的评价,参见宫下忠雄:《力ノ支那通貨論——金及銀取引の研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发行,昭和九年(1934年版)序言。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也曾说:“一等国用支票,转账,二等国用钞票,三等国用硬币,若四等国并市而无之,则用生金银。”参见《上海金融史话》第68页。而〔英〕毛里斯·柯里斯著,李周英等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一书则称:“中国没有铸币通货,用白银重量作为交换媒介。”

⑥ 赵兰坪:《货币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500页。

⑦ 相关近代货币史的著作仅建国前就有刘映岚:《中国货币沿革史》章宗元:《中国泉币沿革》张家骥:《中华币制史》侯厚培:《中国币制史》,耿爱德(E. Kann):《中国货币论》戴铭礼:《中国货币史》周伯棣译:《中国货币史纲》朱僂:《中国信用纸币发展史》徐沧水:《民国钞票史》李骏耀:《中国纸币发行史》沈云龙:《近三十年来我国币制改革的检讨》区季鸾:《广东纸币史》。建国后则有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彭信威著:《中国货币史》魏建猷著:《中国近代货币史》千家驹等著:《中国货币史纲要》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货币史》石毓符著:《中国货币金融史略》董孟雄著:《中国近代财政金融史》等,相关论文则更少。

平行本位，而认为晚清至废两改元时期的币制为多元本位。但有学者持银本位制的观点 或认为中国晚清已是银本位制 或认为自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国币条例》时中国已确立了银本位制^①。更多的人认为废两改元后中国进入了银本位制，甚至有人认为自明代嘉靖八年（1529年）起中国就已是银本位制^②。时人一般称废两改元前，中国商埠为两元并用，而农村则是铜元本位^③。还有人认为是两元并用制度^④。马寅初则认为中国当时的货币既不是银元本位，也不是银两本位^⑤。王业键认为清代与近代是银铜复本位，但有很多不同，而此后至废两改元前则为多元本位^⑥。还有一些人称当时中国币制“实际上尚为铜本位”^⑦。一些近代或民国经济史著作，甚至不谈及晚清及北洋时代的币制而直接论述废两改元或法币改革^⑧。

黄逸平、虞宝棠主编：《北洋政府时期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16页。
李侠：《中国银两本位之史的研究》，《财政学报》第一卷第二期，1942年1月。

意：《大条银及其交易概说》，《交行通信》1933年11月。耿爱德则云：“中国今日实际并无一定之本位币，惟内地居民大半一生所受使用者只有铜币，故按事实言之，今政府虽无明令规定以何种货币为主 而因铜币的流布范围最广 可认为国内真正货币也。”耿爱德著 蔡受百译：《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第1页。

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

马寅初指出：“徒因银本位制 尚紊乱而无统系 如内地商民 通行银元 各大商埠 则以银两为尚 既非洋本位 又非银两本位 非驴非马 深堪浩叹。”（马寅初：《论废两改元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六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他又说：“我国货币之怪状 银两与洋元之畸形制度 犹一家之主妇与侧室权威之不清相等。洋元犹主妇 经法律所规定 但因柔弱而无权威 故畏缩而不前 一切家政 悉操之妾手——银两，但妾为法律所不许，所以无主妇之尊位。此一家侧室众多 犹一国之银两甚多 故妾之中 无一可以管辖全家 犹银两之中 无一可以通行全国 但妾有权威 犹银两之有本位币之资格。一国之内 家家有主妇 犹一国之内 家家有洋元 即洋元可以通行全国 凡家均有主妇 故主妇名正言顺 妾则未必人人都有。”（马寅初：《再论废两改元并答吴经熊先生》，《马寅初全集》第六卷 第33页）他在1932年还说：“然熟察国中生活程度 内地苦工 日得工资 不过铜子数十 则千年来绝迹于欧美之铜本位 正在我国通行 安足以语金本位耶？”（马寅初：《银价跌落救济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六卷 第193页）

⑥ 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北南港，1981年。

⑦ 梁士诒认为：“至改革币制 理论上当然以金本位为目标 惟我国实际上尚为铜本位 犹未至于银本位故目前须从统一银币入手。先须化两为元，使全国为同一之货币。”此为梁氏1918年6月在财政金融学会上演讲国民经济问题时所言，参见《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

⑧ 如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220、247～253页。此类经济史著作极多。

近代货币最为复杂的部分当属银两制度，由于相关文献对此记录极少，因而也是学术界研究最为薄弱的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学术界极少使用的日本东亚同文会民国初年在中国调查并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大正 1918—1921 年 年间版，共计 18 卷]其中有大量关于当时银两制度的资料。曾在东亚同文学院任教，后为神户大学教授的宫下忠雄所著的《中國幣制の特種研究——近代中國銀兩制度の研究》[日本学术振兴，昭和二十七年（1952 年）版]，则是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出版较早的一部关于中国银两制度史的专著。

在货币史研究的成果中还有必要评述一下自 1980 年代以来的中国钱币学研究。钱币学在中国有绝学之称，这门自宋代洪遵《泉志》出现后发展起来的学问 建国后一度沉寂 至 1980 年代中国钱币学会建立后猛然喷发 至今在国内拥有十几种刊物 出版了百余部相关著作。这门从历史、经济、考古、冶金、印刷、铸造、经济等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钱币实物的学科，给货币史研究提供了最大可能复原历史的资料。近代中国，银两由于受控于炉房而极少留下相关文献 但近年来 国内外连续出版了近 10 部关于银锭的著作 从而使人们更深刻准确地认识了实银、虚银及银两制度。现有钱币学已证明，中国近代货币流通状况远比现有的货币史著作中描叙的更为复杂和混乱，一些钱币实物也远未进入货币金融史学家的视野。所有这一切，必将深化中国货币史的研究。

2. 货币与金融机构的关系

钱庄是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现在还有很多不为人们所了解的秘密^①。进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钱业的著作，据笔者粗略的统计有下列几部 李权时、赵渭人合著：《上海之钱庄》 上海

中国传统工商部门不注重文字的流传，相对于要求透明度的现代经济而言，如同“秘密教门”，经营及业务上的口耳相传、师徒关系更是使文字记录失去了意义。其记账数字苏州码已不再使用识者日少。

东南书店 1929 年版 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 上海华通书局 1931 年版 施伯珩著：《钱庄学》 上海商业珠算学社 1931 年版 此外钱业公会编辑出版了《钱业月报》。而有关其他地方钱业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天津の銀號》 满铁调查研究资料第五八编 北支经济调查所编《北支调查资料》第三一辑 昭和十七年编印 区季鸾编著：《广州之银业》，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丛书 1932 年版。

建国后关于钱业的学术著作有张国辉先生的《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华书局 1989 年版），1981 年台北“中研院”出版了郑亦芳著《上海钱庄（1843—1937）》。西文则有 McElderry: *Shanghai Old-style Banks (ch'ien-chuang) 1800—1935: A Traditional Institution in a Changing Society*^① 这是一部研究 1800—1935 年上海钱庄的博士论文。近年来吴景平、马俊亚等 在相关钱庄的个案问题研究上有所突破。上述著作主要以近代钱业的重心即上海钱庄为主要论述对象，但缺乏其他地区相关的研究成果支撑。目前天津、北京、武汉、重庆等地的钱庄、银号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上海钱庄即使在其极盛时代，也与这些地方的钱庄、银号的保持了紧密的业务联系。

有关银行史方面的著作相对较少。解放前有周葆奎著《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 1919 年版），吴承禧著《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以及大清银行总清理处 1915 年编印的《大清银行始末记》和王志莘编的《中国之储蓄银行史》（新华信托储蓄银行 1934 年版），另外，卓宜谋曾自刊其编写的《京兆通县农工银行十年史》。此外日本学者宫下忠雄著有《支那银行制度论》[岩松堂书店昭和十六年（1941 年）初版]。此书是当时日本学者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② 吴景平先生关于钱庄对废两改元态度的研究，马俊亚关于钱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见《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2、5 期。

关于中国银行史论述较为全面的专著，1957年吴子竹译本由台北华南商业银行研究室出版。而建国后除《中国银行行史》^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②外，国内有关商业银行、地方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历史的著作还未多见。而在中国金融业有着重要地位的外国银行除外人所著《汇丰银行史》四巨册外，中华书局1979年曾出版李周英等译自英人毛里斯·柯立斯著的《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毛景安1977年曾在香港威尔生出版公司出版过《在中国的西方银行1854—1973》，杨培新先生在香港出版《华俄道胜银行》^④。但总体而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业务的研究探讨。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建国后第一部银行史著作中所言：“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③，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⑤。

汪敬虞先生的《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原是汪先生早年的系列论文，实际上可视为国

^①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编著《1912—1949中国银行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论文，笔者以为在两行档案资料未出版前，邓宏宏的《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及翁先定的《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1907—1927）》为这一领域中扎实严谨的两篇论文。二文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1912—1949年）》，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档案馆的关于北京中国银行的资料，曾由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出版《北京的中国银行1914—1949》。此外汉口分行史和福建中行的相关资料也已出版。台湾姚松龄著有多部有关张公权与中国银行的作品。

^③ 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1991。英人毛里斯·柯立斯著，李周英等译的《汇丰——香港上海银行》（中华书局1979年版）与此相比则显薄弱。

杨培新：《华俄道胜银行——沙俄侵华历史内幕》，香港经济与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此外寿充一等编辑过《外商银行在中国》（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主要是各地文史资料中关于外国在华银行的情况。

^⑤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页。

人所著的第一部在华外国银行史 论述了 1927 年以前外国银行及中外合办银行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黄鉴晖先生的《中国银行业史》是继张郁兰先生后又一部国人的银行史著作，全书下限至 1989 年。

地方银行的著作 关于晚清官银钱号 有谢杭生的《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 1894—1911》这是一篇博士论文 后收入彭泽益主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0 年版)。笔者 20 世纪 9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近代纸币》则对近代中国地方银行发行货币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而较为全面的则是姜宏业先生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改革开放后 刘光第著的《中国的银行》(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有 20 余页银行史的内容。在国家和中央银行的研究方面则有孔祥贤著的《大清银行行史》(南京大学 1991 年版)及刘慧宇的博士论文《中国中央银行研究 1928—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而 1999 年上海财经大学版的《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则是程霖先生的博士论文 该书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的历程。

笔者认为，与本论文相关较密切的一部中国银行史著作当为 Frank M. Tamagna 所著的 *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ublications Office, New York, 1942) 一书 宋子文作序 此书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 1927 年以前的中国的货币市场 第二部分论述 1927—1937 年的中国货币市场，第三部分是战时的中国金融业。每一部分按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在华外国银行业、国内银行业、存在问题等依银行业务论述其发展及演进。此外王业键先生的《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 1844—1937 年》

① 1958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戴可著《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 银行发行纸币概况》论述了外商银行在华发行货币的情况。

第三部分 也论述了近代银行发展的脉络 对笔者启发很大。

近代银行业最重要的业务是货币业务，因而分析银行业的货币业务的来源即由负债而演化的资产及其出口（即放款及其方向），不仅可以了解近代银行业的兴衰，而且从其货币业务的流向可以看出近代资金的流向，进而得出近代资本与部门经济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均与银行业及其业务的场所——金融市场有关，而何种金融机构掌握了近代货币体系的核心，对货币市场有控制力，这不仅是银行业兴衰问题的关键，也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核心。

3. 货币与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经济学领域，从马克思、凯恩斯到弗里德曼，尽管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但是对于货币在宏观和微观经济运行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却是他们的共识。现实的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也是如此——《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已是所有经济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其研究对象就是货币本身运动及其运动与经济的关系。

“对金融作用的认识，一直沿着两条线索：一是从货币的角度，最先是讨论货币重不重要，后来演变为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二是从大金融的角度，早期是讨论信用和银行的作用，后来推而广之，将其包容一切金融问题，研究金融对于经济增长是否重要”^①。货币与宏观经济的问题最明显的表现即货币价值与物价的关系，并由此影响各部门经济，特别是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将直接影响经济进程，此时货币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在当时的中国，由于货币体系已渐成白银核心型，因而中国货币体系的核心——白银（而在世界却为普通商品）的价值是

问题的核心所在^①。

中国近代与古代经济的最大差异是近代中国形成了较全面的前所未有的部门经济。仅以金融为例，票号没落之后，钱庄业的转型，商业银行的建立，中央银行的发展，投资银行（银公司）的实践，证券市场的畸形发展，信托业、保险业的出现等等，均是国人前所未有的经济实践，而这些部门经济内部的运动发展又备受其自身规律约束，由此形成了动态且相互关联、立体又总体趋势向前的经济模式。因而笔者认为，近代经济史不能像古代经济史那样，在没有部门经济史的支撑下独立完成。

货币对于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的重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不仅是宏观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变量而且是微观经济的外部环境。但是建国以来的近代经济通史类著作中，较少提及货币，或仅论及废两改元、法币改革等重大事件。或仅对货币沿革和变迁进行描述，而对货币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的关系论述则较少。

近代中国，人们对于货币与经济的关系极度关注，并且留下了浩繁的文献。抛开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的议论不谈，即使是政治人物对币制也极度关心。早在宣统二年（1910年），梁启超就说：“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②

从晚清开始，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银价与中国经济的关系，但由于晚清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银价处于总体平稳下降时期，而这种状态对中国宏观经济有利，故笔者所知当时仅有邵金铎著的《银价之研究》（学术研究会丛书部，1921年版），邵氏是国内较早关注银价与经济问题的学者，这种研究在银价变动平缓时期中断了10余年之久。当银价短期剧烈动荡时，人们又集中探讨这一

^① 20世纪30年代的马寅初多次说：“银价问题实为我国今日金融经济问题之中心”（马寅初：《中国与银问题》，《马寅初全集》第六卷第379页）；“银价跌落并不单和一部分人民有关系，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大问题”（马寅初：《银价跌落与人民生活之关系》，《马寅初全集》第六卷第206页）。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4页。

问题。进入 30 年代后，世界银价在短期内剧烈升降，从而形成了 30 年代初期的金贵银贱和稍后的白银风潮，此时，人们对银价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极度关注，并形成了大量的文献资料。

这两次由银价变动而引发的金融风潮，由于影响到了国内经济的方方面面而成了国人谈论经济问题的重心，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如当金贵银贱或银价上涨引发金融风潮牵动整个经济时，康有为说：“夫以五千年文明之古国，万里之广土，四万万之众民，而所以致亡之由，不过为银落金涨之故，岂不大可骇笑哉！”^① 蒋介石则认为这是要“亡国灭种”的大事^②。银行家则认为“今印度倡议金本位，而我中华民国，遂作倒霉鬼矣”^③。而银价高涨之时，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许多商号与富豪，相继破产，——上述情形，与未来隐患，均受美国购银政策所赐”^④。卷入讨论的政府人物有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孙科、胡汉民、戴传贤、潘公展、张寿镛等，政府部门有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等，工商界领袖如徐寄庠、胡孟嘉、李馥荪、赵晋卿、宋士骧、贝淞荪、俞寰澄等，社会团体如上海各公团联席会议、上海商整会，外国团体则有日商联合会、美国亚洲联合会、国联，发表专门见解的学者如马寅初、刘大钧、唐庆增、李权时、杨荫溥、张家骥、朱杉元、刘振东、谷春帆、李一秋、刘廷冕、杨汝梅、唐有壬、寿景伟、徐佩琨、冯柳堂、楼桐孙、戴蔼庐、朱义农、侯厚培、校吉甫、章乃器、静如、子明、童蒙正、李干、黄宪儒、若戎，外国学者则有耿爱德、土屋计左右、吉田政治等，国内报刊诸如《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银行周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更是积极参与。而境内外

^① 《金主币救国议》卷上，第 67 页。

季啸风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46 册，广西师大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66 页。

若戎编：《金贵银贱问题之讨论》一册，上海华通书局发行 1930 年 3 月版，第 37 页。

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编印：《中国白银问题——致美国来华经济考察团备忘录》，1935 年印行，第 14~15 页。

国报刊也加以评论,《大陆报》、《文汇报》、《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正金周报》、《金融商业周报》频频发文。国外报纸如《纽约讲坛报》、《伦敦金银商同业公会年报》、《泰晤士报》也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由此形成了一大批文献。

专著也出了一批^①。在这些专著中,1949年前有代表性的有三部 耿爱德(E. Kann):《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②;谷春帆:《银价变迁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实业部银价物价讨论委员会编:《中国银价物价问题》,1946年版。耿爱德特别强调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谷氏在出版《银之发灾——动态的研究》后在英文《金融商业报》连载文章分析银价与中国经济的关系。而《中国银价物价问题》是由实业部组织国内经济学界精英所完成 出版较晚 可视为当时政府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总体认识。此外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

这时期的主要著作有:盛俊选辑:《银价与币制问题》,上海日知编译社1930年版 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金贵银贱问题丛刊》,1930年版 若成编:《金贵银贱问题之讨论》;陈德征编:《金贵银贱风潮》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1930年编印;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编:《金价暴涨的影响及其救济》,1930年版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银价暴落之根本救济》,编者1930年自刊;《金贵银贱问题参考资料》浙江省教育厅1930年编 夏庚英编:《金贵银贱问题之研究》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版 资耀华编:《金贵银贱之根本研究》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李大年编:《金涨银落问题及其救济》上海启智书局1930年版;〔美〕蕾·库柏著:《银价变动的原因之研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30年印行 刘振东著:《中国币制改造问题与有限银本位》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30年版;W. F. Spalding:《银价问题与远东》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 无出版年月;黄元杉著:《游欧后第一意见书——银问题》,广州图书馆消费合作社1931年版 俞寰澄著:《金银问题讲稿》编者1931年自刊;谷春帆著:《银之发灾——动态的研究》,天津大公报代售1932年版 路易士·张履鸾:《银价与中国物价水准之关系》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1933年印行;沈诵之著:《白银出口问题》作者1934年印行 谷春帆:《银问题》时事问题丛书,1933年版 高永康著:《金贵银贱与中国之币制问题》广州大学法学院1933年版 毕克覆(A. W. Pinnick)著 褚保时、王栋译:《银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英〕格理葛蕾著 余文若译:《银问题与中国》上海民族书局1934年版;而后期世界白银价格上涨时的一些与银有关的著作,也对此进行回顾,如:谷春帆:《银价变迁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王仲武著:《银涨影响用应付方案之商榷》作者1934年自刊;Y. S. Leong著 杨先序(土字旁)译:《银价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俄〕古瑞魏池著,高德超译:《中国与银问题》中国政治经济学社1935年版;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会编印:《中国白银问题——致美国来华经济考察团备忘录》,1935年印行。此外,当时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论著和教材均涉及此问题。

此书在当时影响巨大,不仅有经过修改后的三个英文版本,而且日本也有译本。

所吴大业先生依南开经济指数在《政治经济学报》发表了系列文章^①。郑友揆先生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近年也已汉译出版^②。

对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世界市场上购买白银而在中国引发白银风潮的研究成果,1949年后出版和翻译的作品极多,如郑会欣、任东来等人的著作,美国学者迈克尔·罗索以《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④为题的博士论文从美国国内政策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杨格的《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对此问题的论述,可视为中国政府应对的历史记录。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白银风潮与政治、外交的关系。

4. 政府货币政策对货币本身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近代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币制建设上也是如此,探讨此问题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近年来吴景平先生的《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1927—1937)》^⑤与本书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货币政策莫过于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时人留下的资料和评论早已汗牛充栋。

以法币改革为例,不仅所有的近代经济史、金融史、货币史均涉及此问题,仅就论文而言,近人对1935年法币改革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硕,20世纪80年代后的学术成果如庄大公在其论文中所言“法币改革”是民国史研究中较早有所突破的课题,最早发表的文章为虞宝棠《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4期)此后即不断有关于这个论题的文章发表,较为重要者有虞宝棠《试论国民党政府的

这些文章的精华后收入由孔敏主编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该书中文译本由上海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任东来:《1934—1936年间中美关系中的白银外交》,《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该书有郑会欣译本:《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3年4期)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5期)黄如桐《1935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86年6期)朱镇华《重评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1期)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1期)陈克俭《关于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政策评价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问题》1987年3期)吴景平《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6期)吴景平《英国和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6期)吴景平《美国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6期)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档案与史学》1999年6期)虞宝棠《从废两改元到法币政策》(《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其实到1987年,可以说是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取得了共识,即法币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币制紊乱需要改革,美国的白银政策冲击中国的银本位制度,迫使中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容,外国对于法币改革的反应,英、美支持,日本反对,法币改革的作用,在积极方面是货币制度的进步,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消极方面是浓厚的殖民地性,使官僚资本完成金融独占,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然而十多年后,有关这个问题仍有文章发表,但在叙述框架、基本内容与评价方面则仍然不出前者的范围。关于法币改革相关的档案集和相关文献大都在1990年代才出版,而综观上述近人研究成果,仍缺乏在新的资料上对法币改革的形成作整体分析的文章,因而使这课题仍有持续深入讨论的必要^①。

总体而言,在论述法币改革这一问题时,建国前学者多论述其成功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其通货膨胀的危险

庄大公：《1930年代的经济国难与法币改革》，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未刊稿。